

# 略论南方荆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的人文特征

黄莹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 阐述了南方荆楚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由于多种原因产生了迥异的人文特征,从历史渊源、地理空间、文风不同、风俗迥异四个方面,介绍了南北两地不同的表现,并指明了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荆楚文化; 中原文化; 巴蜀文化; 吴越文化; 秦岭-淮河; 南方人; 北方人; 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 G 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13)01-0075-07

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多元复合,构成“多元一体”的结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元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等)和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因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逐渐形成了建立在粟麦农业基础上的北方儒家文化——中原文化,以及建立在水稻农业基础上的南方巫鬼文化——荆楚文化,两者特点迥异。梁启超把我国北南两种文化风格归结为“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sup>[1]</sup>与北方中原文化的龙崇拜、尊奉黄帝、形成儒法两家和《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相对应,南方荆楚文化则是凤崇拜、尊奉炎帝、形成道家和《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两者的风格是雄浑、谨严与清奇、灵动的比照,有人把北南两种文化的主流风格以“阳刚”与“阴柔”概括,虽嫌粗略,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北南文化的基本性格。

千百年以来,两地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等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人文特征和生活方式依然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中原文化标榜儒学,儒在钟鼎,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滋生伦理规范和内省模式;荆楚文化以道学著称,道在山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沈耽幻想。北有孔子儒学及其所编朴实无华的《诗经》,南有老庄及屈原奇幻瑰丽的《楚辞》,南北交相辉映。北方朴实的理性光华与南方奇丽的浪漫色彩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植根于北方,因而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心多在北方,在长期的南北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之中,北方文化占有总体优势。但是,中国地域广袤辽阔,无论山川水土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各地之间的人文环境往往迥异,地域文化特征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在。中国人文景观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和地域差异性,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特点。要了解荆楚文化,可以从比较的角度透视。本文就把南方的荆楚文化和北方的中原文化做一个对比,以期能对两者有更深刻的认识。

## 一、历史渊源

现代地理学意义上一般以秦岭-淮河为界。秦岭-淮河划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此以北,气候干旱少雨,山峦纵横,植被并不丰茂,以草原为主,而南方动植物种类丰富,气候温和,降水充沛,逐渐发展为农耕经济区。这种自然环境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大致说来,把长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称为南方,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称为北方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两大流域在先秦时期分别诞生了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其影响仍然处处可见。“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sup>[2]</sup>。时至现今文坛,有“海派”、“京派”、“山药蛋”、“荷花淀”等流派,也有“晋军”、“陕军”、“湘军”等之称。“斯声以俗移”,不同地域内的山川、土壤、气候、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以至文化心态等,形成了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和塑造了不同的人

收稿日期:2012-09-04

作者简介:黄莹,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精神。

先秦时代,中原人称云梦泽一带为南蛮之地,说明已有了南、北观念,人们也对各地的人文社会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礼记·王制》篇指出: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谷,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狄,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礼记》中把当时的中国分为中国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一共五个方位的区域。这“五方之民”在居处、言语、衣服、饮食等生活方式上的显著差异,是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显然,发源于“中国”(华夏)的中原文化和发源于“南蛮”的荆楚文化人群风俗相差甚远。“火食”(熟食)和“粒食”(以谷物为食)应该是“中国”的饮食习性,南方“不火食”,是因为“地气暖不为病”的缘故。而与冠带礼仪的中原文化不同的是,“南蛮”在额头上刻饰,有着大体相向的体态特征(“题”是额头之意,《楚辞·招魂》有“雕题黑齿”的说法)。这些南北生活方式、体貌、建筑风格甚至个性等的差异,早就引起了先秦人们的注意。(《礼记·中庸》:“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直至今日,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北方大汉似乎更加勇猛些。秦汉时期,中国大一统,但南北区域依然差异明显。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根据自战国至西汉初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叙述各地的生产、生活及风俗习惯的地域差异,他将全国分为山东、山西、江南、龙门以北四大地区。各个文化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他总结道: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觶,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羨。其民羯羸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僇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

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觶,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南方由于山林富饶,河流湖泊星罗棋布,自然资源丰富。楚人通过“火耕水耨”,种植水稻,渔猎山伐等粗放的经营方式,即能衣食丰足。这就养成了楚人不事力作、寡于积聚的生活习俗。而北方中原地区,由于地少人多,多从事农耕养殖业,再加上水旱灾害频繁,生活艰难,于是善于积蓄,熟悉世故,俭省重农。其中北方因为靠近少数民族,所以北人“僇悍”;南方因为物产富饶,商业发达,所以南人“剽轻”。这些论述是如此精辟,以至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甚为赞同,乃至全文摘抄,少有改动。可见,先秦两汉时期的南北地域,就形成各自鲜明的特点,时至两千多年物换星移,今天仍然以地理人事两者合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域的差异日益明显。自三国开始,南北局面逐渐形成,南方和北方的概念已清楚了。史学家称吴晋宋齐梁陈为六朝,这六朝相继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当时在北方建立政权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称为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播散是由外及里,由里及外,形成双向态势。“五胡”进入中原,相继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与此同时,中原人有的南迁江淮,有的东渐辽海,有的西叩玉门,有的北及阴山,有的南至五岭。北人南迁,由于南北文化之殊,在南方设侨州郡,是为了保持原来的文化系统,实是一种恋旧情结。时间长了,北人的“侨”文化必然与南方本土的文化融为一体。就在这时,南北文化、学风已形成明显差异。北方人以正统自居,遵守周礼,恪守汉注,学风烦琐。南方人以儒学与老庄之学合流,多用新注。南朝刘宋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北方人学问广博,但缺乏见识,不周密,像显处看月。南方人学问专门,精当有见解,但不渊博,如牖中窥日。南北文化各有短长,在文化交流之前缺乏深入了解。《颜氏家训·归心篇》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大帐与大船,对于足不出户的人来说,两地差异不可思议。

此后至隋唐两宋明清时期,虽然南北统一,但由于民俗传承的惯性,各地的风俗特征依然明显。明人谢肇淛曾引用《绀珠集》的记载说“东南,天地之宝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土懦弱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土沉厚而慧,挠之不屈。”<sup>[3]</sup>“剽”是轻捷、聪慧的意思,与西北“近愚”的性格特征形成了强烈的差异。作者还认为,“此数言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当然,这种看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两地人口众多,不能一言以概之,但多少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这种人地关系的传承有历史继承性,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化差异有一定的帮助。北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渐开发,唐宋以来两次重要的人口南迁,南方人的地位日趋显著。在政治舞台、经济领域逐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苏湖熟,天下足”,其人文特征依然不变。明万历时人王士性指出“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不敢强辩。”<sup>[4]</sup>“中州”在明清时期指河南省,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当地民风淳朴,他认为,从总体上看,绝不像江南一带人那样狡黠善辩。中原文化的继承人到了明清,民风依然不改。这是因为“周、宋、齐、鲁、晋、卫,自古为中原之地,是圣贤明德之乡也,故皆有古昔之遗风焉。入境同俗,恍然接踵遇之,盖先王之泽远矣。”<sup>[4]</sup>清雍正年间的李培,引《舆地志略》曰:“山东其地土旷人稀,性豪气刚,易于为变。”<sup>[5]</sup>这些历史时期对山东人性格特征的描写,直到近代,仍然有着相当的真实感。荆楚地区的移民,到了明清时期,又是一番情景。“蕲、黄之间……好习权奇,以旷远为高,绳墨为耻,盖有东晋之风焉。”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南北两地的人群交往空前活跃。通过不断的碰撞与交往,不同区域人群的人文特征依然明显。其实不用笔者啰嗦,今天,只要读者亲身遇到一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其人文特征便立即凸显,差异溢于言表,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 二、地理空间

人是自然的产物,就像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说到的“人类是在自然中并依附于自然而发展的,这种从属关系,包括人类所受的影响和引起人类行为的刺激和动机。即使我们确定地认为,刺激和动机的总和无疑地决定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全部特性根源于自然

情况具体说根源于各个地区和地点的自然情况,……我们只能把人类放在和自然现象并列的地位。”关于南北人文特征的差异,当代地质学家周昆叔强调环境的因素。他说“北国有粗犷豪放的人民和古朴深沉的文化;南国有圆通灵敏的人民和轻灵秀美的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异?”不可否认,北方坦荡的黄土高原和南方山回水转的环境对人类性格陶冶和对文化特点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的地域环境条件及人文社会环境,对一方人群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地域广大,南北的地理跨度达30个纬度,存在着自然地理条件的重大差别。

秦岭-淮河是我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正好把荆楚地区和中原地区区分开来。这是因为:第一,气候类型上:温带季风气候(北)与亚热带季风气候(南)的分界线。第二,温度带上:暖温带(北)与亚热带(南)的分界线。第三,是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所以表现在干湿地区上:半湿润地区(北)与湿润地区(南)的分界线。这些气候条件的限制使得秦岭-淮河北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地理条件:中原地区旱作农业(小麦主产区)与荆楚地区水田农业(水稻主产区);中原地区的温带落叶阔叶林与荆楚地区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原地区的棕壤和荆楚地区的红、黄壤。同时,它还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

荆楚地区处在秦岭-淮河以南,约为北纬30°~33°,属于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雨热同季,使得江汉地区生物生长茂盛,物产丰富,有利于农业生产活动,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具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深居内陆,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低山丘陵与平原相间分布。其地东、北、西三面是山地,南面敞开,东段有淮河,西段有秦巴山地,北部是以大别山、桐柏山至鄂西山地一线的山脉为其屏障;其地形是由狭小的丘陵山地河谷地带逐渐向平坦开阔的江汉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推进。荆楚地区南北居中,长江中游地区河网稠密,水资源丰富。区内河流以长江水系为主,形成交织稠密的江河水网。长江中游段,接纳了陕南、豫西南、鄂西北径流的汉江水系,拥有湘、资、沅、澧诸水的洞庭湖水系等。《汉书·地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皆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荆楚地区一直以来延续着水稻生产、渔猎采伐的生产方式。这种注重个人能力的生产方式,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显得更为简易,对皇权族权的依赖相对较小,并在社会风俗、思想传统与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不曾像中原地区那样“经过严格的‘礼’的教化”,而是都要比中原地区“较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sup>[6]</sup>。这样优厚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自我意识,形成了楚人聪明狡黠,寡于积聚,奢侈浪费,重情感,争意气的性格特征。

中原地区从地理位置看处于黄河流域的腹心地带。大致包括北纬34°~35°、东经110°~114°之间的地区,北有黄河,南为外方山、伏牛山,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中部邙山东西穿越,东部为豫东大平原,形成了群山环抱的地理形势。整个地势西、北、南部高,中、东部偏低,形成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伊洛河平原。境内山势低缓,谷地平坦开阔。中原地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平原,形成地势低凹的开阔地带和盆地较为平坦的开阔地。在这些平原和河流两旁,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且易于开垦耕作,全区平均年降雨量虽不很丰沛,但却相当集中在作物生长季节,无霜期也相当长。这一切,适宜于发达的农业种植,男子多从事农业,农闲时从事编织、狩猎、畜牧;妇女从事采集、种植、纺织、制陶。这样中央国家控制土地的分配,各自在小块土地上劳作的自耕农,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农耕经济。曾国藩说“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士,乡村多朴拙之夫。”<sup>[7]</sup>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流动性小,社会交往不发达,“树之谷,艺之麻,养有性,出有车,无求于人。”形成了当地人安居乐业、宁死不屈、知足常乐、勤劳俭朴,重家庭,重伦理的性格特征。李渔的《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悍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十分形象,似乎正好对应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不同的人文特征。

### 三、文风不同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认为,春秋以前,我国的道德政治思想可以分成为帝王派与非帝王派,前者是入世的国家派,后者是遁世的个人派,前者大成于

孔墨,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为北方派,后者为南方派。北方派的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的理想在创造新社会;诗歌为北方学派所专有,南方学派仅有散文文学;北人多坚忍之志,强毅之气,南人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但南人的想象力之伟大丰富又胜于北人远甚<sup>[8]</sup>。这样孔墨和老子成为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在思想界的代表。在文学艺术方面,先秦时期现实主义风格的《诗经》和浪漫主义《楚辞》成为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在文学艺术上的代表。其鲜明而各具特色的文风为后来几千年南北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不可超越的标杆。我国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发轫很早,在《左传》的记载中,便已出现“北风”和“南风”之语(《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师旷唯歌南北风者,听晋、楚之强弱。”)明代屠隆认为“周风美盛,则《关雎》、《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车邻》、《驷骊》;陈、曹风奢,则《宛丘》、《蜉蝣》;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sup>[9]</sup>这里各地的地域环境不同,在文学风格上产生了明显的不同。

人们自觉区分南北文风的不同,则是六朝乃至唐代的事情。刘勰《文心雕龙》似已初见端倪。《物色》篇径直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里已初步涉及到了地域环境对形成不同文学风格的作用与影响。北齐邢邵在其《萧仁祖集序》中进而明确说道“昔潘(岳)、陆(机)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延之)、谢(灵运)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南北朝时期的文风,南北两地已形成了显著的差别。以民歌为例,北方由于少数民族内迁中原,加上战乱不止,所以民歌慷慨激昂、气势豪宕,境界宏阔,情感粗犷。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南方民歌,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子夜歌》)对恋人的思念深沉含蓄,缠绵婉转,对人情和自然界的描述很细腻。唐人修的《北史·儒林传》也从经学的角度介绍了南北之异:北人多守汉代旧注,南人乐于采用魏晋新注。“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民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尊于郑氏。”因此,“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

叶。”<sup>[10]</sup>可见当时南方人的学问简单精要,北方人的学问广博粗略。《世说新语》也提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文如牖中窥日<sup>①</sup>。(意思是:北方人学问广博,但缺乏见识,不周密,像显处看月。南方人学问专门,精当有见解,但不渊博,如牖中窥日。)

到了唐朝,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从而也更有条件和条件对南朝和北朝文学的风格特点作出总结和评判。《隋书·文学传序》曾这样说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南方文学作品的特点偏于清绮、缘情。清绮即为清新绮丽,柔婉纤细,追求自然。缘情自然是崇尚抒情或申舒性灵,所以多为抒发情感的歌咏。而北方文学风格刚劲粗犷、朴拙质直,趋于厚实,所以适合于论理。这诚如清人谢元淮《填词浅说》所说:“以词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而柔远,北主劲激而沉雄。”这大致概括了南北词作各自不同的风情韵致。况周颐《蕙风词话》认为孕育南北两种不同文风的重要要素之一,便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

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又进而说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着之文,不外纪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sup>[11]</sup>这里又说南方文学作品具有言志抒情的特点,而北方之文不过是记事、析理而已。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sup>[12]</sup>这些说法都注意到南北两地因自然条件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因为中原地区人们生存艰难,故多关注现实,且北国旷野的辽阔单调,农耕生活的单一循环,使其具有厚重、朴实、具体、实在的理性精神,产生了注重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荆楚地区经济生活充盈,故有余欲关注审美,且南方的美丽江湖湖泊确易激发人的审美想象,而气候的潮湿炎热易致病,又使人幻想有神灵保佑以祛除疾疫,因而产生了关注自然的浪漫主义文学。王国维也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

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螻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sup>[13]</sup>

古人云“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sup>[14]</sup>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地域环境不同人文特征也不同。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长久以来在文风上的不同,受到了历代文学家的重视。

#### 四、风俗迥异

古人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sup>[15]</sup>。《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北两地的自然条件及其人文社会环境,对两地的人群塑造有着直接的影响。南北人群具有不同的类型,这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而纷繁多样的生活方式,则凸显了各地人群对各自的自然条件及人文社会环境的不同反应<sup>[16]</sup>。

古代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南船北马。南人乘船北人骑马。我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南米北面。南方人爱米饭,北方人喜面食。就人口的生物学特征而言是南矮北高,南方人矮,北方人高。语言的地理差异表现为南繁北齐,即南方语言繁杂,北方语言比较单一。一则我国北方多地势平坦的高原和平原,交通联系方便,老百姓交往、交流的机会多,彼此融合,因而语言差异不大。二则南方多丘陵山地,地形崎岖,交通闭塞,不利于人们交往,久而久之,便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土话”。就建筑风格来说是南尖北平和南敞北封。我国居民屋顶的坡度从南往北是逐渐减缓的。南方屋顶高而尖,原因是南方的年降水量大,气候又炎热,高而尖的屋顶既利于排水,又利于通风散热。北方由于降水较少,所以屋顶多建成平顶,这样既可节省建筑材料,还可兼作晾晒作物的场所。另外,我国南方的园林建筑,轻巧纤细,玲珑剔透,内外空间连贯,层次分明,苏州的拙政园是其典型代表。北方园林建筑则平缓严谨,粗壮质朴,内外空间界限分明。我国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作出总结“南方为棚,多敞口。北方为窝,多封闭。”可见,从适应环境、居住舒适出发,南方建筑注重通风散热,北方建筑利于保温保暖。从气候上来看是南涝北旱。我国隶属东亚季风气候,年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南方不仅雨季历时长,而且由于夏秋季节降水集中,因而常常出现洪涝灾害。而华北、西北降水较少,再加上垦殖、放牧过度,蓄水抗旱能力差,所以面临严重的“水荒”影响着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另外,

从总体上看是南经北政。北方历来是我国的政治中心,秦、汉、唐定都长安(今西安),元、明、清定都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又是首都,这更确定了北方在全国的政治地位。而自明清以来,南方经济的飞跃发展,使其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加强。因而“北方出当官的,南方出经商的”,这两句话较好地反映了南北方不同的政治、经济生态。此外,形容南北方地理和文化差异的词汇还有南拳北腿、南瘦北胖、南下北上、南骗北抢、南辕北辙、南腔北调、南柔北刚、南甜北咸等等之类的俗谚远近闻名。

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的南北风俗差异已经非常明显。当时因为地域和物产不同,饮食文化亦有明显差异。北人喜吃羊肉,喝大碗酒;南人喜吃鱼,饮茗茶。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作了介绍,讲王肃入乡随俗的变化:“(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喝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孝文帝)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为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名称珍;以味犷言之,甚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莱、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酷爱吃鱼喝茶的南方人王肃,到了北方,受其气候地理等条件的影响,饮食习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力。

另外,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也形成了迥异的家族民俗,使得南、北方的家族职能和家族关系,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譬如,“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胜国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争嗣续者,止以殓葬时作佛超度所烧钱纸姓名为质。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户当差为亲。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为奴。”(《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宛、洛、淮、汝、睢、陈、汴、卫主要是指今河南省一带。王士性认为,这一带自元代以来,因兵火战乱人口凋零,及至明朝时各地移民纷至沓来,当地民间不立祠堂、同姓为婚、不置宗族以及同宗关系淡漠等等,家族风俗呈现出与南方不同的景观。而同时在南方,家谱学的发展,与水土丰饶带来的人口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的王士性《广志绎》里讲到江南地区的人文特征时说“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阊阖易为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悻,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而与傲缙绅。”<sup>[17]</sup>南方风气奢侈,容易聚党犯法,家族间关系紧密,祠堂祭祀发达,族谱宗牒等自明清以来成为中

国民间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南北风俗的差异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民国年间,胡朴安在《中华风俗志》中对南北人群的生活习性乃至思维方式,有过以下论述“北京人民,食必葱蒜,衣必红绿,戏必皮黄。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实人群进化之障碍。”<sup>[18]</sup>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胡氏的观点显然颇有偏颇,但他所阐述的南北人文风俗异趣的现象,也确实不无道理。以上只是南北风俗差异之万一,却反映出地域文化的特点。在今天的社会,依然可以见到这种不同地域环境中人文特征的差异,比如河北人遇上了广东人,或是电视剧中常见的上海婆婆遭遇北京媳妇,这些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见证着我们地域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五、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特性,在几千年后,在中华民族大融合大迁徙后,依然在后来的继承人北方人和南方人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鲁迅在《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谈到“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sup>[19]</sup>著名学者王国维对南人和北人的评价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sup>[13]</sup>林语堂抓住南北人文的差异特点说“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体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喜欢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林语堂把中国分为“粗犷豪放的北方”和“温柔和婉的南方”。他以为:尽管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被共同的主干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实际上,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并不亚于南欧地中海人和北欧日尔曼人的差别。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体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喜爱文学,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sup>[20]</sup>。显然这是很有见地的概括。千年以来,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积习难返。这种地域文化强烈的历史

继承性、地域的差异性和凝固的内聚性,直到今天,每一种地域文化景观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渊源,都可以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出其变迁的自然、社会背景,认识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评论家们在谈到地域环境对人文特征的影响和作用时,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轻视其他因素(譬如政治和经济因素等)的倾向,但他们的确又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一定范围内的真理。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事实上,这如同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所导致的偏颇一样。我们当然不能把地域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夸大到失当地步,尤其是到交通发达的近代以后,不仅南北文风的差异在缩小,而且整个世界都在寻求沟通。但话又说回来,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也决不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在古代的中国是这样。诚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论及“历史的地理基础”时,他一方面肯定“自然”“地理”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但又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过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sup>[21]</sup>

当代社会由于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等等的高速发展,地域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会呈现减弱的趋势;但是就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文化的地域特色无疑将长期存在。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中,都保存着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决不因此完全消失。这些民族气质的特点,形成所谓种族。种族对于某些思想体系的历史,譬如艺术史,给于一种毫无疑问的影响。”<sup>[22]</sup>

我们既要注意地域文化心理在历史传统中的守恒,又要注意它在当代的转化。倡导地域文化、地方流派,决不意味着排斥交流,更不会影响文化走向现代化,关键是对于“地域”和“地方”的概念,要跳出“本乡本土”的圈子<sup>[23]</sup>。要研究经济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给南北方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新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南北文化

固有特质和未来走向,推动它在新时期的发展。

#### 注 释:

- ①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窟中窥日。”

####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中国地理大势论[M]//《饮冰室文集》之十. 北京: 中华书局, 1936: 87.
- [2] 浙江省博物馆. 黄宾虹文集·杂著编·九十杂述[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
- [3] (明) 谢肇淛. 五杂俎: 卷三(地部一)[M]. 台北: 伟文图书出版社出版公司印行, 1977: 56.
- [4] (明) 王士性. 广志绎: 卷之三——江北四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7.
- [5] 李 培. 灰画集: 卷七(第四册)[M]. 山东: 训练总监编辑局编刊, 第427.
- [6] 李泽厚, 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349.
- [7] 曾国藩. 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M]//郑 焱.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4.
- [8]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续编: 第五册[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影印本.
- [9] (明) 屠隆. 鸿苞集: 卷十八[M].
- [10] 魏 征. 隋书·儒林传[M].
- [11] 刘师培. 南北学派不同论[M]//刘申叔先生遗书(上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560.
- [1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第四册·文集之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30.
- [13]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M]//静安文集续编: 第五册.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 1983.
- [14] (明) 蒋大鸿. 平洋千金诀[M].
- [15] (东汉) 班固. 汉书·王吉纪[M].
-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人文地理学·社会地理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215.
- [17] (明) 王士性. 广志绎卷之四——江南诸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8.
- [18]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 卷三[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19.
- [19] 鲁 迅. 南人与北人[N]. 申报·自由谈, 1934-02-04.
- [20] 林语堂. 中国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274.
- [21]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85.
- [22]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2卷[M]. 北京: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74: 87.
- [23] 俞思念. 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J].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3).

[责任编辑: 刘自兵]